

对话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利:

创业的本质是创新型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陈彬

今年5月刚刚过半,但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先后有河南、广西、山东等多个省份公布了本省的大学生休学创业政策,而且允许大学生休学的年限也越来越长,最长已经达到了8年。而据最新统计,目前国内已经有超过20个省份发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

休学创业政策频出的背后,是政府对高校创业持续多年的热情支持。只是,这样的支持是否到位,面对大学生创业?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重点支持呢?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利。

大学生创业人数短期难以激增

《中国科学报》:自从教育部允许学生休学创业以来,各省纷纷颁布相关政策,而且允许休学的年限也越来越长。但与此同时,有人也对此提出质疑,甚至担心如果大量学生选择休学创业,可能会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您怎么看待这一政策的利弊?

张玉利:在我看来,这不会是一个大问题。近些年来,我们提出了很多创业口号,教育主管部门也陆续提出很多相关文件。这些工作的确使大学生创业的数量有所增加。然而尽管如此,大学生从事注册公司和商业活动的行为比例依然很小,而且这一比例在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更不可能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基于创业者依然是一个小众群体的事实判断,休学年限的适当增长并不会带来多大的问题。事实上,目前我国多数高校采取的学分制其实就是一种弹性学制,有的学生因为生病也可以延长学制。因此,延长学制鼓励大学生创业会对一些学生起到鼓励作用,但对于全体学生而言不是很大的问题,不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允许休学年限多久比较合适?

张玉利:从一般的创业规律而言,从识别创业机会到创业行动的实施,这一过程其实是比较短的。调查发现,从创意到创业活动,一般只有一年左右,有些甚至更短。即使比较长的创业行为,

3年时间也足够了。因此,从政策有效性来说,即使考虑到大学生连续创业的问题,允许休学的时间也不用太长,3~5年的时间足够了。

创新型人才培养使创业成为自然结果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内高校创业整体发展固然迅速,但似乎总给人一种浮于表面的感觉,您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创业教育是否还缺乏一些更深层次的内涵?

张玉利:对于大学生创业而言,不管是政府鼓励还是政策支持,其实都是外因。相比之下,内因更重要。不可否认,当前大学生创业的确存在浮于表面的现象,有些甚至认为大学生创业行为也属于生存型。换言之,缺乏创新性。大学生应该热衷于创造新奇的事物,热衷于解决难题,而不停留于经商,有些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应该和下岗工人争夺同一类型的创业机会。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程度的偏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大学生的优势是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有闯荡的机会,也有实验和尝试的机会。因此,社会和高校应该引导鼓励大学生多开展创新型创业。在我看来,创新是创业的本质,我们需要有创新驱动的创业。而创新的基础是科学,是有科学依据的解决实践问题和价值创造。

因此,大学生创业一定还是要和专业结合起来,和研究结合起来,用新的理论和创新性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大学生应该具有的优势,同时也是高校应该加以引导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创业的本质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创业教育不是培育项目,而是对“人”的教育,您认为“项目”教育和“人”的教育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张玉利: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标题很吸引人,叫作“创业80%会失败,但创业者的人生80%却会成功”。这句话很有道理,创业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对社会进行奉献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载体和手段。创业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可以说,创新型人才培养使创业成为结果和自然产出。从这个角度上说,要使创新人才和创业结合起来,就需要高校在创业和专业结合的基础上,使得创业和市场结合,契合社会的需求,并与消费者的痛点相结合。这是大学需要改进之处,大学需要让自己更加开放,整合资源形成更广阔的创业平台。

总之,创业是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大学生职业发展、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载体和路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当然,这样的路径并不仅限于创业这一种,我们希望学生能通过不同路径进行探索。社会发展也需要路径多样化,这样也有助于社会和谐。

创新创业型大学 20 问

第九问 高校对外部创业创新压力的回应会否导致高教领域的分化?这种分化会引起知识组织与教学的变化吗?

答:在英国,这种情况很明显。多年来,高教行业和利益相关者的紧密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毋庸置疑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正接受“参与”型大学这一观念,从自身强项专业开始做起。正如之前所说,很多之前的多科技术学院(1992年以后成立的大学)有更悠久广泛的社区参与度的历史。老牌院校的“研究型”大学则关注其在科技发展方面的价值以及相关网络的建立。英国官方科研评估中引入的“影响力”指标对所有大学的参与度也产生了影响。大学在教学领域的差别相对较少。再怎么讲,教学能力出色和科研能力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明显。

域外传真

发明家詹姆斯·戴森爵士曾经说过:“工程师是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居住以及人口老龄化等21世纪的挑战提供实际解决方案的一群人。而我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

对于这一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英国皇家工程院曾经对工程人才进行过分析,结果显示,到2020年,为应对业界的需求,英国大约需要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在创业问题上,政府更多的依然像一个旁观者,觉得似乎制定了政策就能水到渠成,这其实远远不够。”



政府需要创造机会

《中国科学报》:前段时间,您组织召开了一场关于创业失败的研讨会。会上您提出不应再仅仅宽容失败,而是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坚持学习的态度。这种观点具体到创业教育中应如何体现?

张玉利:对于创业失败,我有三点基本看法。首先,创业失败是一种客观规律,特别对于具体的创业项目而言,创业失败率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要正视创业失败的客观事实,并将创业失败的资源利用起来。失败既有一定偶然性,但也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某些政策的利弊影响,如果能让创业者有更多的了解和准备,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此,我们不仅要开设创业基础和通识课程,讨论创业成功的因素,更要开设创业失败的课程,从中探讨创业的一般性规律,这对创业是有好处的,对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其次,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式是从别人经验中学习,另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自己从实践中摸索。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基于失败的学习是学习的重要途径,我们不应忽视。

第三,在教育范畴内鼓励创业失败的价值挖掘,可以帮助学生乃至老师探索学习方法。我在给本科生上课时,每节课都会提醒大家四个字——提问、总结。其中,总结其实就是反馈。失败是每个人主观上都不愿意接受的。换言之,失败会使当事人有更大的刺激,而这种刺激会使得

自己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能借此及时反馈和总结,我就有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中国科学报》:对于高校的创业教育,您认为政府和社会还应该给予怎样的帮助和支持?

张玉利:现阶段,政府与社会帮助的核心应该是如何将政策落地的问题。应该说,我们目前的相关政策、措施已经不少,但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在创业问题上,政府更多的依然像一个旁观者,觉得似乎制定了政策就能水到渠成,这其实远远不够。通俗来讲,创业是创业者和机会、资源之间的动态匹配过程。创业者首先要敢于创业,在这方面,现行的各种鼓励政策已经起到作用。在资源方面,现行的“互联网+”的背景下,在平台建设和网络建设方面的提速也很有帮助。但机会却不总是客观存在的,需要人们创造。而且不单要创业者创造,政府的创造也很重要,政府需要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从创业成本角度看,西部的确成本更低,但创业者依然愿意向“北上广”集中——因为机会多才能够驱动创业,创业者通过对机会的追寻才能整合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在这方面,政府、学校和社会的重点不应只是实施更多政策,而应在政策讲解、机会创造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针对现在政策的实施以及可能出现的新政策,我建议一定通过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创业者在创业中遇到的问题暴露后,政府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这才能够产生效果,并且自我检讨之前的政策存在哪些漏洞。如此,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更大的改进。

既然官方强调大学的责任和参与度,那么之前的多科技术学院和新兴大学走在队伍的前面,以独特方式积极重塑就不足为奇。比如说有就业能力/就业型大学、实用知识型大学、创业型大学、社会企业以及“商业参与”型大学。高校如何应对蓬勃发展的信息和知识的国际化流动,或者所谓的“大数据”引发了持续的讨论。这一问题,更多的是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全球影响引起的,更多的对大学不再是探索与学习的绝对权威和其唯一性的认知,有人可能对此会有不同意见。更多的讨论集中在概念的转移,从之前的学习模式一,即大学作为独立的探索和学习空间,到学习模式二,即高度参与学习,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人分享和交换知识。

第二种模式,知识的发展与生产更具情境化,针对不同的环境,以问题为中心,更多地反映到实际应用中。这样一来,将会挑战已有知识组成形式,需要更多的跨学科途径,有可能产生新的跨学科研究理论和范例。大学将要加强知识交流传播的能力,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更紧密的合作。从实践中学习,探索传播知识的新方法。在这种概念下,大学从一个小众组织变成更为开放和综合的学习机构。在紧迫的形势下,这种改变会使得原来为传统学科成立的学院将围绕创造出学习和探索的战略性领域展开,联系目前较为有特色的学科,顺应未来社会的文化、经济、环境、社交和科技的发展需求。

这一讨论实用知识的概念并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专业知识”,而是涵盖更多,是要满足学生对于价值观的理解,社会发展所需的各个领域,文化的丰富等相关知识进步的需要。与“智慧”的概念相似,即个人能力可以结合经验和知识,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更深刻的理解。总体上,学术界的争论热火朝天,但在英国,实践还有待加强。

栏目主持:张静(NCEE 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

研究领域同样需要工程师

■理查德·弗明斯

100 万名新鲜工程师。雇主、政府、教育部门以及职业团体正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方法。由此,英国到处都是学校与雇主联谊会、实习等活动与项目。而大学努力填补与工业界的鸿沟时,也就产生了一个风险,那就是大学忽略了自己的需求。

我们要怎样激励我们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工程领域毕业生成为未来的学者?

这是英国皇家工程院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份报告显示,在2012年,只有3.2%的英国工学毕业生在专业领域选择了继续学习和研究。这一比例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些意外,但学者们对此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知道这正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有这样一位毕业生,他有着成为一名出色研究人员的潜质,但当他被询问是否有兴趣继续读博时,他却说自己已经在业界拿到了offer,而他也认为直接工作是一个比读博更好的选择。

在此,我并不是在争论未来业界需要优秀的工程师这一事实的,但我们也知道,世界一流的研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方面能起到非常

关键的作用。这样的研究在英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吸引学生作研究了呢?

在我看来,这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工程领域的毕业生对于业界的职业发展、工作经验以及机会等,都能够获取到大量的信息,进而使他们充分了解这一职业。但如果他们不决定从事研究工作的话,他们却很少能得到在科研领域有所尝试的机会。

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第一次置身于科研环境的机会,就是他们在做毕业设计时。而这显然已经有些晚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在多多体验科研。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和调查为基础的能够让学生接触学术方法的训练,而这些可以在本科生课程中较早地应用与安排。同样的,在校生也应当更早地与工程学的教授们交流,以了解他们究竟在做什么。这都可以让读工程的学生慢慢地了解什么是研究。

如今,工作实习已经成为学生获得工程学位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对此感到很骄傲,但是他们应当同样考虑为学生提供研究性的实习机会。

高教视点

教育舆情的科学管理是当务之急

■铁铮

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与此有关的谣言、流言、传言也多了起来。如何积极、有效地应对由此引发的舆情,对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及教育机构而言,都是十分严峻的考验。防范和应对由高考引发的突发性舆情,科学有效地管理教育舆情,应该成为各有关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应该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根据媒体报道,5月15日有人在网上发布信息,称山东省2016年春季高考文化考试开考前泄题。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当天作出回应,称该信息为假,及时解除了考生及家长的疑惑,平复了由此引发的紧张情绪。这应该是第一时间积极回应的案例之一。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及时回应,既澄清了事实,又表明了态度,控制了负面舆情的发酵与蔓延。

由于牵涉到几乎所有家庭、而且不仅影响一代人,因此教育备受全社会的关注,这也使得教育舆情有了许多特殊的性质。在网络网住了一切的时代,任何舆情和网络有直接的关系。教育网络舆情的科学管理理所当然地成了重中之重。每年的高考又是教育界最引人瞩目的大事,因而科学管理与高考相关的教育网络舆情,就成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做好这一工作不是权宜之计,而应该成为教育舆情管理的新常态。

一个流言、谣言、流言盛行的社会,是非理性、非和谐、非正常的社会。对于净化舆论环境,全社会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管理教育舆情应该成为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之所以用“管理”而不用“应对”的概念,是因为我们不能等问题发生后才来应对,需要事先做大量工作,需要教育和引导等。

科学管理舆情首先需要扩充人员。这只能依靠加强教育引导,借以提高全员的网络素养。否则,单靠几个管理人员的力量显然杯水车薪。中国近14亿人口中已有一半网民。可以想见,由于目的、立场、观点以及素质教养的不同,如此巨大的人群在网络上的表现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网络把关人的丧失使得各种各样的信息未加过滤、不加筛选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不断历练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

不容否认,互联网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每一个流言的背后,特别是重大舆情的背后,都可能会有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梗捣乱。对此应该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科学管理舆情是十分艰巨的政治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

有这样一句比喻:当真理还没有穿上鞋子的时候,谎言已经走遍了全世界。面对如此这般残酷的现实,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还是争分夺秒、积极回应;是满腹牢骚、怨天尤人,还是顺势而为、化解危机?公众、社会显然需要的是后者。在秒杀时代,力争第一时间回应关切是教育网络舆情管理的重要环节。第一时间发现和掌握舆情是问题的关键。网民是全天候的、不放假的,教育网络舆情管理也应该是全天候、白加黑的。

各教育部门负责人首先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正确认识教育舆情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教育网络舆情管理落实、落细、落小;建立和培养熟悉网络、善于传播的骨干队伍。真正发挥新闻发言人的作用。发布信息者要从根本上解决不愿说、不敢说、不善说的问题;建立和密切良好的媒介关系,善于借助社会媒体的力量扩大传播影响力;增强自办媒体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使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和公众心理的分析,为教育舆情管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要特别注意高考等时间节点,在重大政策出台前要做好相应的预案。

(作者系北京高校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会理事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2014年,我们推出了一个名叫“谢菲尔德大学工程学领导力学会”的组织。这一组织可以给予本科生一个机会,使他们在入学早期就可以接触到科研。我们每年提供多达10个研究奖学金,学生们需要完成为期10周的实习,实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3D打印、核废料、碳纤维材料等领域。通过这样的训练,无论未来是在学界还是去业界工作,他们都可以获得转化利用的技能。

在理想的界域中,工作与科研这两种选择不应当是互斥的关系。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工程学博士以后也可以进入业界,反之亦然。英国工程界应对未来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培养一部分既懂研究,也有业界经验的工程师。更多的毕业生选择从事研究实际上最终会对业界有积极作用。

但是,要让更多聪明的年轻人留在学界,这需要高等教育体系作一点改变。如果我们要在大学和业界都有最好的工程师,大学需要开始告诉学生,作研究也是通往工程师职业领域重要的第一步。(作者供职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韩琨编译)

记者快评

应对「懒教」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温才妃

近日,一条关于“兰交大”学生不满试题简单写公开信“试题过于简单,考题多年没有变化,重复率高达80%以上,有同学全靠考前突击……”3名兰州交通大学的学生实名“上书”校领导。

从前,只有学生抱怨考卷太难;如今,学生不满试题简单,这不禁让人感叹“世道变了”。而“世道变了”的原因在于,高校教学中“懒教”行为的滋长。教师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科研等其他事务,而对待教学马虎了事,课堂上对着PPT、教材照本宣科,考前给学生划重点……于是,也就有了考题多年不变,重复率高达80%以上的典型“懒教”行为。

同样让人困惑的还有学生的态度,有人认为写信者是“学霸”,显摆多事。在一些学生看来,老师出题“放水”,学生考前突击而过,对师生双方都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行为——既保证了课程通过率,也让大学生轻松摘得学分,这种老师的课程自然受学生欢迎,在评教、学生票选最喜欢的老师中还能脱颖而出。

师生双方不惜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而换取双方便利,不得不说是当今大学之悲哀。而这也正是当前就业质量不高、普通院校学生考研难以被重点高校认可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尽管学校已经下令整改,但这只是单改试卷难度就够了吗?

浮躁的学风背后,反映的是高校育人的急功近利。追求短平快,追求表面上的和谐与相安无事,而不问育人结果、社会认可。若要改之,必然要先从学风上进行重新整肃,对于各方面的“懒教”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营造师生上下人心向学的氛围。

当然,“懒教”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指挥棒对于教学的轻视。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的氛围使得教师对上深失去了热情与动力。不久前,教育部提出大力推进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强调“更加重视对教学水平的评价”。借此机会,一些面临转型的高校是该好好考虑如何在教学上下功夫,如此才是它们长远的生存之道。